

胡同不老：北岛散文重构的北京岁月

钟怡雯*

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摘要

本文以北岛散文集《青灯》、《城门开》、《蓝房子》为中心，探讨北岛在散文里重新建构的北京图象。离京多年后返京的北岛，感觉到前半辈子的所有生活记忆随着老北京城一起消逝，他决定用自己的旧北京去否认如今的新北京，于是有了《城门开》，它象征着北岛“开城门”，进入昔年北京记忆的深处，取出属于自己的部分。有些文字链接到诗歌史中的北岛，有些则是铭刻在少年赵振开内心的旧事。散文虽然是非虚构文类，但写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建构性本质，在细节上难免有所取舍；至于回忆，也有不可避免的变异性。本文借由杜威·德拉伊斯玛对回忆或怀旧写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探讨了北岛笔下重现的老北京故事。

关键词：北岛，散文，北京，胡同，怀旧

* 钟怡雯，博士，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退休教授。

Hutongs Unaged: Beidao's Prose Reconstruction of Beijing's Historical Experience

CHOONG Yee Voo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 Linguistics,
Yuan Z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centers on Bei Dao's prose collections *Blue Lamp*, *City Gates, Open Up!*, and *The Blue House* to examine the image of Beijing as reconstructed in his prose writing. Returning to Beijing after many years of displacement, Bei Dao experiences a profound sense of loss, as the memories of his earlier life appear to have disappeared along with the old city itself. In response, he turns to his remembered, "old Beijing" as a means of negating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ed metropolis. This impulse culminates in *City Gates, Open Up!*, a work that metaphorically enacts the opening of the city gates, allowing Bei Dao to descend into the depths of his memories of past Beijing and to retrieve those fragments he chooses to preserve. Some of these prose pieces resonate with the Bei Dao known from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while others are deeply inscribed with the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Zhao Zhenkai's youth. Although prose is a nonfictional genre, the act of writing itself entails an inherent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which inevitably involves selection and omission at the level of detail; memory, likewise, is subject to unavoidable variability. Drawing on Douwe Draaisma's reflections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reliability of memory and nostalgic writi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tories of old Beijing as reconstituted in Bei Dao's prose.

Keywords: Bei Dao, prose, Beijing, hutong, nostalgic memory

一、前言

北岛（1949-）在中国当代诗歌史的版图上，走过一段影响深远的英雄之旅，名满天下的〈宣告〉（1976）和〈回答〉（1976）出现在大量诗选、诗歌评论和诗歌史当中，尤其格言式的金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早已成为穿越一个时代的高音。有些学者和菁英读者会沿着〈回答〉，上溯到它尚未修订前的原版〈告诉你吧，世界〉（1973），或者进一步走进〈你好，百花山！〉（1972）。那时北岛尚未成名，只有诗歌圈子里的知青比较了解他的诗，北岛的自我和启蒙意识还没觉醒，此刻更适合叫他的本名“赵振开”，看上去十分普通的一个北京知青。二十出头的赵振开，曾经跟百万红卫兵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谒见毛主席，对那一代人而言，毛主席绝对是众人心头的一座超级大山，无比雄伟，且遥不可及。

作为诗歌描述对象的百花山，座落在北京郊外，海拔不及两千公尺的主峰，对北京人来说足够当成一座大山，当赵振开对百花山喊出“你好！百——花——山——”，并得到它真切的响应，令他感动，却又不安。此诗，“流露出诗人内心的混乱与挣扎，诗人与伟人之间并不对等，也还没有产生半点乱臣贼子的革命情结。母亲的慈祥只能是百花山中的幻象，现实中只有城楼上的父亲威权”（陈大为，2022，页 170），赵振开还不是诗歌的王者，还不是知青世代的代言人。

百花山成为一面镜子，赵振开看见真实的自己。这种庶民心境，到了来年那首〈告诉你吧，世界〉（1973）有了巨大的转变，一定有某件事或者某个突发的念头，让他那宛如千年暗室的心灵，一灯即明，让赵振开蜕变成严格意义上的英雄诗人北岛，以及“这个民族真正的长子”（张闳，2003，页 71）。所有的诗歌论述沿着修订后的〈回答〉，一路展开论述，形塑出崛起于 1970 年代末的朦胧诗人北岛、1989 年后的流亡诗人北岛、2006 年回归并定居香港的北岛。

究竟赵振开在写〈你好，百花山！〉和〈告诉你吧，世界〉之际经历过什么，似乎没有当代诗歌史关注过，无论是洪子诚、程光炜、吴思敬、谢冕或张桃洲的诗歌史专著，都没有特别讨论到这一环节，显然当时的撰史者没有足够的外部数据来展开这方面的论述。即使在朦胧诗红红火火统治着中国当代诗坛的那几年，大家对北岛身世的认识依然有限，诗歌以外的“北岛故事”是相当贫瘠的，我们仅仅知道他笔名的由来，知道他和友人创办了《今天》，知道那个当作大本营的“三不老胡同一号”，加起来也许有几百字，但远远不够，那个怀着“英雄成长史”秘密的“少年赵振开”始终藏身于文字之外。

北岛开始“在天涯”的流亡之后，慢慢写起散文来了，它竟成了北岛诗歌的“补天石”。

二、补天石：重述陈年的旧事

1998 年, 北岛在《今天》发表一篇很短的散文〈彭刚〉。昔年老友彭刚在美国自杀的消息, 让北岛回想起 1973 年刚认识他的样子, 后来两人不知何故吵了一架, 北岛记得当晚“从朋友家出来, 搭上二十二路末班车。坐在车中间的连接桥上, 我们随之颠颠簸簸转动。窗外的光影变幻不定。此后我们很少来往”(北岛, 2009b, 页 75)。这是北岛在散文里提及的一件北京旧事, 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得不清楚, 而且缺乏细节, 它倒是显露出一个特色: 意象语言的连用。此特色持续贯穿北岛往后的数十篇怀旧散文。北岛在记忆里重建的末班车上, 两人没有对话, 他更专注在车内的颠簸和窗外的光影变化, 由此营造出可怕的沉默, 那一架吵出永久性的裂痕。这篇散文后来收录在《蓝房子》(2009), 书里写的都是天涯事, 只有那么两篇旧人故事。

1989 年后北岛一直在欧美漂泊, 在异乡见了很多文人, 偶尔遇到从中国逃出来的朋友, 在散文里用零零星星的句子记述着。直到 2006 年, 北岛再次被邀访香港, 来年 8 月便定居下来, 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他对香港有很深的感触: “按中国绘画原理来说, 留白是画面中最讲究的部分, 让人回味。直到我自己漂流海外, 才多少体会香港人的内心处境, 他们就是中国这张画的留白”(北岛, 2009a, 页 140)。没承想, 流亡诗人从此在香港这片“中国留白之地”定居下来。一年后北岛写了〈断章〉(2008), 时间回到 1970 年的北京。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一九七〇年春, 我从河北蔚县工地回北京休假, 与同班同学曹一凡、史康成相约去颐和园。那年春天来得早, 阳光四溢, 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们并肩骑车, 拦住马路, 三十二路公共汽车鸣长笛, 轰然驶过, 扬起一阵烟尘。

曹一凡是同学也是邻居。在“上山下乡运动”大潮中, 他和史康成是立志扎根北京的“老泡”。所谓“老泡”, 指的是泡病号留在城里的人, 为数不多但不可小看——除了有抵挡各种压力的坚韧神经外, 还得深谙病理知识及造假技术。幸好有他们留守, 几个月后我随工地迁到北京远郊, 每逢工休泡在一起, 读书写作听音乐, 被邻居庞家大嫂称为“三剑客”。

北京近乎空城, 颐和园更是人烟稀少。进正门, 穿乐寿堂, 玉兰花含苞欲放, 木牌写着“折花者罚款五十元”。在排云殿码头租船, 绕过石舫, 向后湖划去。一路说笑。后湖更静, 唱俄罗斯民歌, 召来阵阵回声。我们收起桨, 让船漂荡。(北岛, 2009a, 页 197)

这是北岛第一次重返历史记忆的现场，文革是一种集体记忆，每一个人都被扣留在这个大架构里，尽管个别际遇在小处略有不同，在大处都脱离不了大时代轨道，个体记忆之间往往互相纠缠，有的甚至被主流的大叙述所遮断或被埋葬。一旦重述旧事的权力回到单一个体身上，我们即发现新的问题：“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不完全的、被添加上色彩的。记忆的记忆也是如此，它们还带来额外的问题，它们让你了解到，你再也无法获取原初的记忆，因为你不可能回到当初看待这个事件时的观点。”（杜威·德拉伊斯玛著、谢树宽译，2016，页182）

当北岛用当下的文字去追忆三十八年前的旧事，还可不可靠呢？“上山下乡”时期泡病号应该可靠，那种事实难以捏造；“北京近乎空城，颐和园更是人烟稀”，从政治时空的状态来考虑，似乎很合理；但三剑客出游当天，“阳光四溢，连影子都是半透明的”就显得诗意，“进正门”后的描述未免太清晰。倒是三人在船上“一路说笑”却过于模糊，不知是因为太琐碎所以忘了，总之说笑的内容被北岛取消，只剩下俄罗斯民歌。要是拿〈彭刚〉一文来对照，即可看出他在叙事策略上另有选择。北岛对人物互动，一向从简，彼此的谈话内容经常被剪裁到极限，他喜欢寓情于景，由画面代替言说。这三段铺陈，也表露出文革知青另一种较欢乐、自在的日常，不陷落于刻板化的“苦难叙述”的泥淖里。

作为“补天石”，接下来，史康成在漂荡的船上演出了本节的重头戏——挺胸昂首朗诵〈相信未来〉（1968），震撼了长期被颂歌和战歌驯化的赵振开，“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当时几乎人人写旧体诗，陈词滥调，而郭路生的诗别开生面，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意外的窗户”（北岛，2009a，页199），这一段文字后来被大量引述，作为郭路生启蒙了北岛诗歌写作的证词，虽然过于武断且夸大，他们二人走的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此诗顶多定位为“启发”。

话说回来，当时赵振开听到郭路生诗歌的感受，很难原汁原味保存三十八年，追忆此事的北岛早已不是当年不谙新诗为何物的赵振开，他是北岛。郭路生的诗歌能够对他产生多大的实质影响，是否达到启蒙的程度，他自己最清楚，在此也没有多说什么。“充满诗意的春日”，是北岛回忆这一段记忆的策略，“诗意”作为重构记忆最含蓄的滤镜，把不必说透的话藏起来，为诗歌史补上充满诠释空间的一笔。

〈断章〉共分九节，按时间前后排序，彼此并不相连，故曰断章。第一节写1970年被郭路生的诗歌启发；第二节写到1971年9月林彪之死，北岛反省了文革以来的种种，突然有了一番觉悟：“时代，一个多么重的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我们曾在这个时代的巅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突然成了时代的孤儿。就在那一刻，我听见来自内心的叫喊：我不相信——”（北岛，2009a，页201），这段文字又是一块重要的“补天石”。赵振开在1970年被郭路生开启了新的诗歌视

野, 在 1971 年的政治事变中“觉醒”, 再磨两年, 到 1973 年才写出〈告诉你吧, 世界〉, 听来合理。

〈断章〉第三节写 1973 年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和芒克; 第四、五节写 1974 年的中篇小说《波动》手稿的惊魂史; 第六节写 1976 年 1 月周恩来逝世, 人民为推翻江青而骚动; 第七节写 1976 年 7 月 28 日的唐山大地震, 以及前一天妹妹溺水而亡; 第八节写 1976 年 9 月 9 日传来毛泽东的死讯; 第九节写他们创办《今天》杂志。每一节都紧扣着诗歌史或政治史的脉动而写, 当然北岛不会让它们沦为流水账, 在听到毛泽东死讯那一刻, 他特别留下“大逆不道”的一幕: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 会此一笑, 但笑得有点怪, 有点变形, 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摸出半瓶“二锅头”, 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斟满, 三人默默干杯, 再斟满, 我们的笑容变得舒展, 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这回有戏了,” 芒克低声说。(北岛, 2009a, 页 215)

这一段叙述很压抑, 有点像充满隐喻的政治电影。芒克说了一句, 严力和北岛什么都没说。在文本之外, 三人应该说了一整晚的话, 却被“诗意”的策略过滤掉了。“这回有戏了,” 比写下一整晚的赘言更为有力, 因为故事的后续发展大家都知道了。这篇瞄准大事件而来的〈断章〉, 在北岛诗歌研究上起了补天作用, 是“诗外”的旁白, 却又处处点到即止, 很像北岛流亡后的诗歌。

散文虽然是非虚构文类, 但写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建构性本质, 在细节上难免有所取舍; 至于回忆, 也有不可避免的变异性。研究人类记忆的荷兰学者杜威·德拉伊斯玛 (Douwe Draaisma, 1953-) 针对“自传里的回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他的看法很合理: “当你运用回想的能力时, 除了属于较年轻的自己的某件事物于现在出现, 另一方面, 你此刻想法和情绪的一些元素也会进入记忆之中。记忆并不是档案里的数据, 在你查阅之后, 还能够和取出时的相同状况一样将它归档。使用记忆就会改变记忆” (杜威·德拉伊斯玛著、谢树宽译, 2016, 页 180)。北岛把他在 1970 年代所干的每一件大事, 依序放进〈断章〉, 看似断续, 却抓紧事件的因果, 逐一回答了学者的提问。

此时北岛已在香港定居十一年, 不再流亡于欧美, 定下心来。其次, 他当然看到中国第三代诗歌崛起后的态势, 若想要以以往一样对中国诗歌产生具有统治性的影响力, 是不可能的。其三, 尽管风云不再, 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诗歌史都绕不开北岛, 都绕不开由他引领天下的朦胧诗大潮, 那可是一段宛如英雄史诗的传奇旧事。北岛无法重返中国当代诗歌的中心, 内心难免焦虑。他主编的《今天》在海外复刊后, 推动了一系列重写文学史的活动, 刊载了大量怀旧散文, 再结集成《持灯的使者》(2001), 主编刘禾不认为此书是单纯地为文学

史提供原始文献，它不仅逼迫我们重新思考文学史写作，而且它本身即是一种边缘化的文学史写作（刘禾，2001，页 xvi-xvii）。

从北岛在《今天》杂志规划、推行的编辑成果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断章〉并非单纯的小回忆录，它是北岛专为自己的十年黄金岁月、自己的诗歌写作史，打造的一颗特大版“补天石”。当他一一取出这十年时光，再归档，每个情节的拿捏，都可能蕴含北岛为自己补写“英雄成长史”的想法。在传奇氛围的营造上，确实有他独到之处。

这篇散文最初是为了北岛和李陀合编的《七十年代》（2008）所写，〈断章〉定稿于2008年10月，李陀的〈序言〉定稿于2008年11月18日，接下来这部五百八十四页的大书就出版了。被文革占去一半的1970年代，对书中三十位作者来说，肯定是一段毕生难忘的青春岁月，大部分人只是单纯地缅怀过去，李陀可不这么想，他在〈序言〉中流露出巨大的焦虑：“对这样一个不在乎没有昨天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北岛、李陀，2008，页 xi）。于是他和北岛编了这本“挽救昨天”的书，他们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都为在其中展开的‘昨天’的画面是这样的陌生而感到震惊。我们还相信，这样的震惊也一定会带来对历史记忆的重要性的重新估量”（北岛、李陀，2008，页 xi）。此书在中国文学的边陲之地香港出版，以繁体字的姿态，更显现出它跟中共官方历史的对抗。至于〈断章〉，北岛几乎是把它当成诗歌史的出土史料来写，企图在诗歌诠释史的暗处，“点亮一盏青灯”（北岛，2009a，页 22）。

北岛在〈断章〉前一年发表的〈远行——献给蔡其矫〉（2007），写下这么一段话：

此刻，我坐在大学宿舍的书桌前，窗外风雪肆虐。我极力回想我们间的最后一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沉入我关于故事的混乱驳杂的印象中；而早年交往的细节，像雨后蟾蜍一个个蹦出来，似乎为了展示时光倒错的意义。是的，我们自以为与时俱进，其实在不断后退，一直退到我们出发的地方。（北岛，2009a，页 76）

北岛在流亡多年后，跟前辈作家蔡其矫在文字里重逢。1975年冬天他们在艾青家里认识，相隔三十一岁，却成忘年之交。这篇散文既写蔡其矫的生平，又写他跟北岛，以及《今天》之间的故事，不时浮现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氛围。一个变幻莫测的大时代，依旧沉沉压着所有的中国诗人。北岛在诗歌里没有办法勾勒一个完整的时代，这个文体有困难，他选择散文，可以更从容去重建那个大时代的艰辛与美好，顺便补上诗歌史的留白处。

上述提及的北岛散文, 固然能读到一个被召唤回来的 1970 年代, 所有人事物都发生在风暴的中心——老北京城, 但老北京是模糊的。1970 年代以前尚未写诗的赵振开, 是空白的。

三、城门开: 创造自己的北京城

2001 年冬天, 北岛的父亲病重, 经当局特别许可让他重返阔别十三年的北京。经过一番大规模都市更新的北京, 已改造成高度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且以北岛熟悉的长安街来说吧, 这条六百年的大街, 到了北岛开始流亡的 1990 年代, 进入空前的大建设时期, 一口气新建二十一栋气势宏伟的新建筑, 建设总量是建国四十年来的四倍, 其中包括由贝聿铭设计的北京中国银行总部大楼 (2001 年 5 月落成)。1998 年为了庆祝建国五十周年, 长安街进行全面整治, 来年又拆除三千面广告招牌。这条横越天安门的大街, 最已不是北岛印象中的样子。“即使再有心理准备, 也还是没想到, 北京已面目皆非, 难以辨认, 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 (北岛, 2010, 页 xi), 北岛返乡受到的冲击很大, 对北京的新生没有半分喜悦, 他前半辈子的所有生活记忆随着老北京城一起消逝, “从那一刻起, 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冲动: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 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 (北岛, 2010, 页 xi)。于是有了下一本特写北京的散文集《城门开》(2010)。

这篇序很短, 不到一千字, 最重要的不是上面引述的重建北京之缘由, 而在下面这一段: “在我的城市里, 时间倒流, 枯木逢春, 消失的韵味、声音和光线被召回, 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 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 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 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 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 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 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 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北岛, 2010, 页 xi)。这番话正巧契合了杜威·德拉伊斯玛的记忆理论, 而且是北岛主动迎上去: “回忆之所以成为回忆, 是因其保存了本来的样貌——某种韵味、感受、情绪、形象——如今它被写成文字, 同时为了可读性而必须成为一则故事的一部分, 或许作者比任何人都更痛苦地理解到, 语言不仅是朝向读者踏出必要的一步, 同时也是离开记忆的一步。作者们知道自己是用文字创造一个世界, 而不仅是描述一个世界, 而他们自我表达中最细微的差异也会让那个世界中的事物移位” (杜威·德拉伊斯玛著、谢树宽译, 2016, 页 184)。我们必须关注的是“可读性”和“移位”。北岛散文原本就有一贯的写作策略, 从不完整描述事物, 并简略细节, 而是透过暗示性、象征性画面来代替直接的陈述, 往往是利用某种充满诗意的氛围, 来导引诠释者的方向。

看来北岛打算在《城门开》主动移位，进入记忆内部，取出他想讲述的东西，用可读性最高的文字，创造自己的北京城。不过，他当真这么做了吗？而且北岛的散文会不会离开诗歌史的野地，不再补天了呢？

先谈书中的一篇〈北京四中〉（2009），它有另一个篇名叫〈走进暴风雨〉，署名方式很特别：“赵振开，笔名北岛，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学生”。北岛从未真正写过年少的自己，在规划《城门开》之际，他和老同学曹一凡、学弟维一（黄其熙）合编了《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2011），收录十八篇散文，记述了文革暴风圈里的故事。我们这才晓得，原来北京四中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中心，原来少年赵振开如此深入地参与了文革，他在四十余年后，用一篇很长的散文“走进暴风雨”，重新检视自己的过去，而且努力重现事件的细节，重现自己和周遭同学的言行举止，对那个一贯以诗意导向的北岛来说，绝对是破格之作。北岛尝试以少年赵振开的身份和心智，回到文革“小历史”的现场，完成自己的“前传 1965-1969”，下接“断章 1970-1978”。随手挑一段，看看北岛如何刻划赵振开的内心世界：

一九六六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课间休息，同学们大谈革命理想与生死关头，好像每个人都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我暗中编造牺牲前喊的口号，并反复排练，在想象中，周围必是青松环绕。我甚至把指头放进门缝，越夹越紧，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认，若大刑伺候，我当叛徒的可能性很大。（北岛等，2011，页 198；北岛，2010，页 134）

文革是大历史，即便是北京四中的小历史，它的细节有众多参与者，很难在回忆录里动手脚，虽然免不了细微的移位。北岛选择了真诚、热血的“少年笔法”面对过去，于是我们在小历史的缝隙中，读到一则只有赵振开自己清楚的旧事。从这个时间点的语境和氛围来判读，它有一定的可靠性，在这里虚构出不存在的事实，没什么意义。若细读全文，当能在历史事件与个人事件之间，看到陷落在混乱中的北京城，那是一个由学生势力统治的世界，大量逼真的细节，建构了那段不可思议的红色岁月，建构了大部分读者感到陌生的少年赵振开。〈北京四中〉在《城门开》里不是孤独的，前有〈北京十三中〉交待 1962 年夏天到 1963 年夏天的故事，后有〈大串连〉补上 1966 年 9-11 月的壮举，基本上凑齐了“少年赵振开”在中学时代的成长史。这三篇散文见证了文革，也形塑了年少的自己。一旦脱离集体记忆可以印证的范围，北岛便进入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小北京，进入一个更单纯的传记写作领域。它的私密性，让北岛在写作上显得更自由。

北岛选择以〈光与影〉作为全书开卷之作，想必跟他重返北京时的视觉冲击有莫大的关系。1950 年代的中国真的穷，这十年间，国库的外汇储备金在 0.45-

1.80 亿美元之间起伏,“人均国内生产毛额”(GDP)排名世界第 88¹,当时老百姓看不到这些数据,只能感受在地乡镇的兴衰。在北岛的印象里,“光”成了观测京城繁华指数的一个凭借物,也是纪录百姓物质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标。他还记得“在儿时,北京的夜晚很暗很暗,比如今至少暗一百倍。举个例子:我家邻居郑方龙住两居室单元,共有三盏日光灯:客厅八瓦,卧室三瓦,厕所和厨房共享三瓦(挂在毗邻的小窗上)……我的同学往往全家一间屋一盏灯,由家长实行‘灯火管制’。”(北岛,2010,页 1),不得不说,北岛的观测角度真的十分敏锐,从灯火确实可以粗略推算出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要是一屋一灯还得管制,就太悲惨了,这让北岛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尽管,北岛自己家里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既然灯火象征着个别家庭的穷困,那么,街市呢?“五十年代末,长安街竖起了现代化集束路灯。华灯初上,走在长安街上特别自豪,心明眼亮,似乎一眼就能望见共产主义。相形之下,胡同灯光更加暗淡。一离开那康庄大道,就又迷失在北京胡同无边的迷宫中”(北岛,2010,页 3)。当时北京路灯少,有些胡同根本没路灯,这就很能够理解为何北岛会用光暗,将北京城区分成三个世界,明亮的长安街、暗淡的胡同、灯火明灭的住家。光影成了记忆的标记工具,暗处明处,交互构筑,注记了 1950 年代北京的枯荣。光,是贫富或枯荣的隐喻,也成了北岛追忆北京时浮现的“记忆因子”(mnemonic factor)。不过,穷困并没有腐蚀人心,共产主义就在光明的前方。“似乎一眼就能望见共产主义”,没有比它更生动的说法。

北岛散文如其诗,在关键处,一笔入魂。

〈光与影〉提到北岛喜欢逛东安市场,在改建成东风市场之前,“各种小铺摊位错落有致,应有尽有。在我记忆中,那是个光的迷宫,电灯、汽灯、煤油灯和蜡烛交相辉映,扑朔迷离。在各种光照下,那些店主和顾客的脸显得神秘莫测,只要把那瞬间固定下来,就是一幅民俗生活的长卷。偶尔有一缕阳光漏进来,缓缓移动——那是最古老的时针”(北岛,2010,页 7)。我们不确定这是否北岛在追忆时经过加工、修缮、重建的美景,为了让光影在东安迷宫里像艺术电影般缓缓移动,整个画面是静音的,滤掉旧市场必有的杂乱与喧嚣,北岛希望在记忆里留存光影,形成一张可以回味无穷,没有污点的老照片。

即是策略,也是心思。

从〈光与影〉进入北岛自传体散文,同时也进入他建构的老北京城。

¹ 根据世界银行(IMF)统计的列表,1960 年美国 USD2,881 排名第一,日本 USD470 排名第 29,马来西亚 USD299 排名第 42,中国 USD92 排名第 88,台湾没有列入。

“关于北京，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儿，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就这一点而言，人像狗。要不那些老华侨多年后回国，四顾茫然，张着嘴，东闻闻西嗅嗅——寻找的就是那记忆中的北京味儿”（北岛，2010，页9），〈味儿〉是北岛对北京记忆进行的第二道工序：冬储大白菜散发出的霉烂味儿、大小煤球炉蜂窝煤炉的煤烟味儿、空污的灰尘味儿、悠远如箫的槐花味儿、“大白兔”高级奶糖味儿，五味杂陈地贯穿了他的北京岁月，甚至还渗透到〈三不老胡同一号〉，他清楚记得，“那烤白薯的糊味，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三不老胡同一号。由此出发，我走了很多年……”（北岛，2010，页67），这都是老北京胡同生活的味道，形成一种以传统饮食文化为核心的空间感，无论对少年赵振开或中晚年北岛来说，每一种气味都是一个记忆标记。

遗憾的是，胡同从1980年代的3,665条，经过大规模拆除后，到2003年只剩下1,928条²，北岛的胡同记忆折损了大半，能够用散文留住的，十分有限。

北岛不放弃，他设法用〈声音〉留住一些旧日的声音：“六十年代初的北京，静得像个村庄，早上居然能听见公鸡打鸣。……。楼下出现人声。脚步纷杂却清晰可辨：男重女轻，劳力者浊。劳心者稳，老人滞中有间歇，孩子则多变”（北岛，2010，页18），北岛打从心里羡慕那个赖床不起的赵振开，在寂静的清晨，从四楼，可清楚收听到被胡同放大的各种声音。第二种声音是古典音乐，那可是“六十年代初，父亲花了四百多元人民币，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无疑当时高科技集之大作：四种速度选择、自动停放及速度检测调节系统。在我的想象中，音乐是从红红绿绿的指示灯中流出来的，淹没了我们，生活变得透明，好像住在玻璃房子中”（北岛，2010，页41）。有了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有了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以及帕格尼尼《第四小提琴协奏曲》，比起一房一灯的同学，北岛的家园简直是天堂了。后来这些唱片在文革期间，竟然横生出意想不到的枝节。

北岛很少为了建构北京的地方感，特别去描写某一个地方。有一处，却不得不写，便是前文提及的“三不老胡同一号”。这可是今天派的大本营，朦胧诗的起源地。

不过北岛没打算把这篇〈三不老胡同一号〉写成我们预期的那个样子，他从1957年写到此处成为“北京抄家的首选目标”为止（最后五百字才草草提及在此装订《今天》、结婚后迁出、2001年重游）。这篇散文的笔法有点复杂，北岛展示了他对“大院”空间的描述，两栋楼，八户人家的生活点滴，曹一凡就住他家楼

² “1986年出版发行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记载，北京四城区的街巷胡同为3665条。2007年出版发行的《北京胡同志》记载，截止到2003年底，……四城区共存有胡同1928条。2021年，根据高德地图资料统计，北京市区内共有胡同1004条，而这个数字的范围包含了北京城区和郊区。”（师毅，2022）

下的 433, 北岛家住 443。北岛在叙事中, 穿插了两则母亲的口述、三则父亲的笔记, 为某些事作见证, 排除了事件的虚构性。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别于“一屋一灯”的穷人日子, “三不老胡同一号”住的是文化人、知识分子、国家中下层干部, 生活条件还不错, 最差的郑家也有三盏日光灯。这里贮存着赵振开童少时期最快乐的时光, 他是孩子王, 所以很多段落写得热闹非常, 文字里透出典型的怀旧味道, 就像林海音写她的城南。

顺着时间往下走, 北岛必须描写文革对“三不老胡同一号”的摧残, 住户们被拷打、侮辱、自缢、抄家、流放、上山下乡, 简直成了文革浩劫的一个缩影。此文的终结很有意思, 北岛在 2001 年故地重游, 在本文用时光倒流的缩时方式重述了历史:

与邻居们告辞, 暮色四起。在原防空洞的位置, 盖起标准化楼房。往前推三十年, 那些杨树, 正等着被砍伐的命运; 往前推四十年, 那些太湖石, 正被吊进卡车, 运往兴建中的军事博物馆; 再往前推六百年, 郑和凭栏眺望后花园的假山, 暮色中掌灯, 鸟归巢, 万物归于沉寂。(北岛, 2010, 页 88)

“三不老胡同”, 原是郑和的故居, 郑和小名三保, 后人把三保太监故居的“三保”念成“三伯老”, 再念成“三不老”。北岛的三不老岁月, 是北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多年后再回首, 格外沉重。行文至此, 万物应当归于沉寂。

四、结语

《城门开》象征着北岛“开城门”, 进入昔年北京记忆的深处, 取出属于自己喜欢的部分, 或者说, 自己用文字想留下的部分。有些连结到诗歌史中的北岛, 亦可视之为前传或外传; 有些比较单纯, 是铭刻在赵振开内心的童少事迹。古老的北京城, 总是悄悄隐身在北岛的故事背后, 他把自己的北京记忆用不同方式写下来, 总是不忘带上一点诗意, 让那些原本栖止于大时代里的小故事, 不致于太沉重。

大概十年后, 他在一次访问里说: “我的北京早就不存在了, 这个距离、时间的差异比什么都大。记忆是可以被唤醒的, 在写作过程中, 一道道门被打开, 通向一个个暗道。对于香港读者, 《城门开》这种经验应该有普遍性——因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廖伟棠, 2012, 页 73)。北岛想重新建构他的北京岁月, 惟有城门开。

参考书目

- 北岛、李陀（2008）。《七十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北岛（2009a）。《青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北岛（2009b）。《蓝房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北岛（2010）。《城门开》。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陈大为（2022）。英雄之旅：重返天安门的北岛诗歌。《中国现代文学半年刊》，41，165-192。
- 廖伟棠（2012）。《浮城述梦人：香港作家访谈录》。香港三联书店。
- 刘禾（2001）。《持灯的使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师毅（2022年1月28日）。《北京到底有多少条胡同？》。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3160935269146712>
- 张闳（2003）。《声音的诗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赵振开（2011）。走进暴风雨。载于北岛等（主编），《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页195-220）。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Draaisma, D. (2016)。《怀旧制造所：记忆、时间与老去的抒情三重奏》（谢树宽译）。漫游者出版社。（原著出版于2013）。